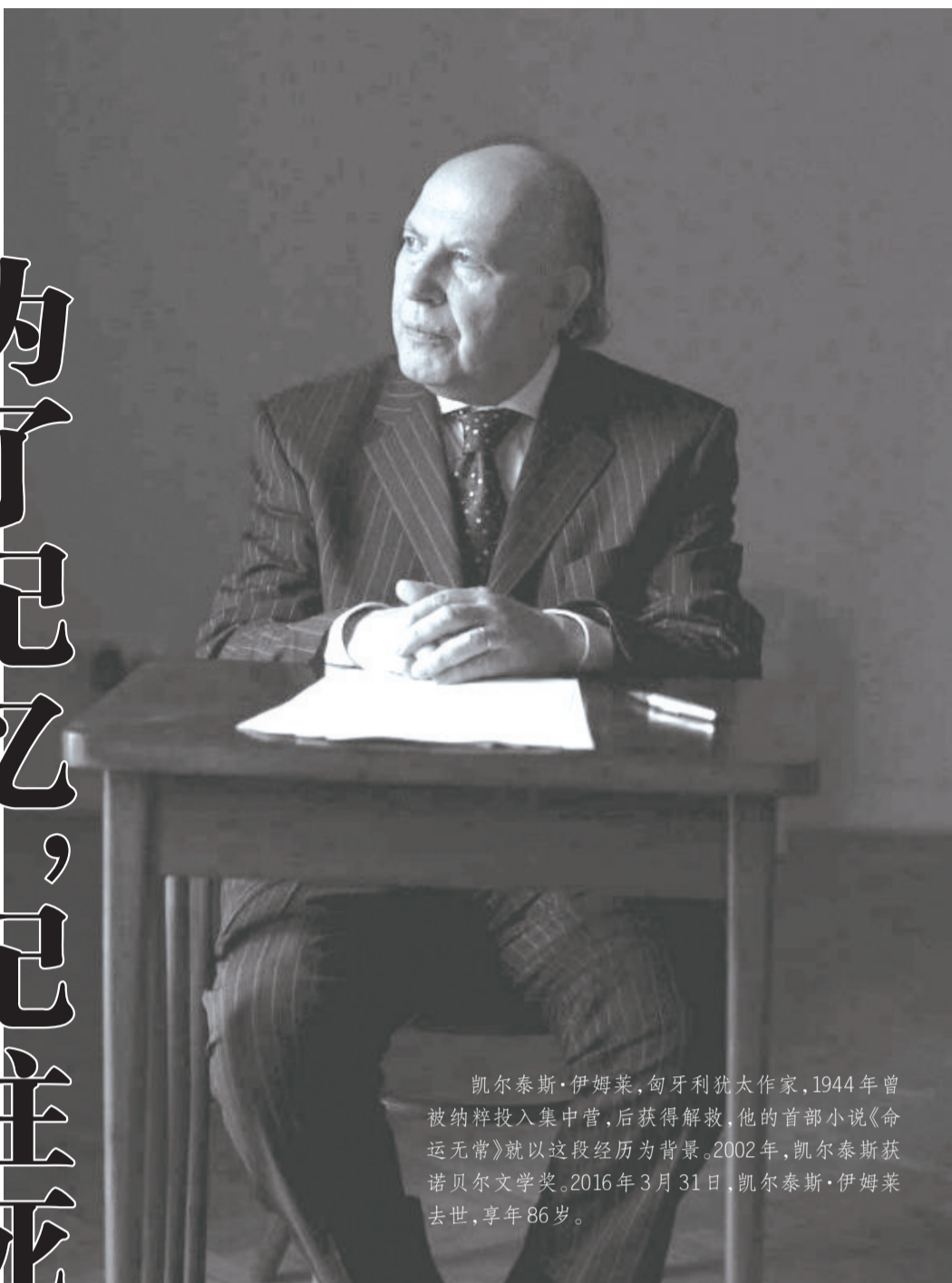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为了记忆,记住死亡

余泽民



凯尔泰斯·伊姆莱,匈牙利犹太作家,1944年曾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后获得解救,他的首部小说《命运无常》就以这段经历为背景。2002年,凯尔泰斯获诺贝尔文学奖。2016年3月31日,凯尔泰斯·伊姆莱去世,享年86岁。

凯尔泰斯死了,2016年3月31日凌晨4时死在布达佩斯家中。他死得很平静,在黎明之前为一生对生与死的思考画上了句号。在我看来,这是老人的最后一部作品。因死过一次而活下来 这位86岁的诺奖得主是经受多年帕金森氏病的折磨后死去的,“病故”是媒体和外人的注释,并非作家本人的。在凯尔泰斯看来,“人们偶然地降生,偶然地存活,并合情合理地死亡”。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感是在善意地提醒人们对死亡的思想还不透彻和充分;他认为,死亡是创作之道、生命之道,是抵达自我的意义。“以后有朝一日,假若我的生活变得沉重得令人无法承受,我终究还是渴望死亡。这是对命运的最后讽刺,是人类最圆满的出演”。我相信,老人在死

去时没有恐惧,因为他早就看透了死亡,甚至14岁时就已经死过一次。2002年,凯尔泰斯准备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意外收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馆馆长沃尔哈德·尼格寄来的一个信封。凯尔泰斯曾进过两家“死亡工厂”,先是奥斯维辛,后是布痕瓦尔德。邮包里除了一封贺信之外,还附有一个小信封,馆长事先向凯尔泰斯说明了装在信封里的东西,并善意提醒,假如他没有足够的心力,就不必拆开。凯尔泰斯拆开了信封,里面是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囚犯当日情况记录的复印件。在“损耗”一栏里写着:64920号犯人,凯尔泰斯·伊姆莱,1927年出生的犹太人,工厂劳工,死亡。凯尔泰斯·伊姆莱其实出生于1929年11月9日。他解释说是在营监写错了年份,事出有因。凯尔泰斯被从奥斯维辛转

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故意多报了两岁,还谎称自己是工人,他是想让纳粹觉得自己更有使用价值。至于材料里记录的“死亡”,他在处女作《命运无常》中做过描述,是因为他被从普通营房转入了“病房号”——焚尸炉的“候烧室”,被送到那里的都是丧失劳动能力——丧失了使用价值——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凯尔泰斯活下来是个意外。他在一次采访中称:“我因为死过一次而活了下来。”他因此接近死亡,了解死亡,正视死亡,并思考死亡。凯尔泰斯生命的故事就是死亡的故事,他后来所有作品都诞生于一个匈牙利犹太少年的死亡。除此之外,他还拒绝生子,在《为一个未诞生孩子的安息祈祷》中冷静阐述为什么不想让孩子降生到这个将被剥夺自由和命运的世界里。他在最后一部小说《清算》里,直接让一位从集中营里幸存的作家写完书自杀。这个结局并非虚构,想想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罗马尼亚诗人保罗·策兰和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吧,他们都是犹太大屠杀的亲历者、幸存者 and 控诉者,都是在创作巅峰不堪活着的折磨而毅然选择自杀。其实,凯尔泰斯又何尝没动过死的心呢? 在《船夫日记》里,凯尔泰斯写到:“近来,我热衷于搜寻一样东西,一块块往事的碎片,这只是为了表面意义的记录、回忆。我将死掉。人死后能留下什么呢?印记着他们生活痕迹的,是几样家什和一两张账单。”他还写到:“我将我的写作视为对心灵的补偿,我将我与写作的关系视为对心灵的补偿,我将写作的重复性动机视为痛苦,我将痛苦视为灵感,我把从一切疾患中痊愈视为死亡。”最后这句话正是对大屠杀幸存者自杀的最好的诠释了。或许有人会说,与上述三位作家相比,凯尔泰斯是位长寿者,这说明他没有读懂凯尔泰斯,没有捕捉到他作品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凯尔泰斯否认自己长寿,他在日记中说,他是通过一次次写作推迟了死期。在推迟的过程中,“要练习死亡,要熟练于死亡——怎么做呢?首先,总要从死亡的角度(从悬崖的另一边)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具有优势:因为东欧人的生活教导人死亡”。名字和身份的羞辱 在凯尔泰斯笔下20世纪的东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遭到分割的匈牙利,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是羞辱的地方。他曾摘抄马洛伊·山多尔的一句日记:“在今天,无论在哪儿都要受辱地活着。” 屈辱,是凯尔泰斯一生中体验最多的感觉,无论是生活在祖国(“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它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与众不同的地方”),还是使用母语(“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了那些凶手”)。他在小说《笔录》里,通过一次经过匈-奥海关的遭遇,把日常性的羞辱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的躯体已被刺得无完肤……我已经失去了忍耐能力,我已经不能再被伤害了。我失败了,虽

然我看上去是在乘火车旅行,但是列车载运的是一具尸体。我已经死了……” 凯尔泰斯还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辱,“凯尔泰斯”在匈牙利语中意为“园丁”,这并不是犹太家姓,只是某代人为为了融入匈牙利而改的匈牙利化的家姓。到了凯尔泰斯父母那一代,甚至放弃了犹太教,也不会说希伯来语。结果凯尔泰斯仍未能逃过屈辱的命运,被投入集中营,从集中营活下来又继续作为犹太人受到歧视和排斥。2002年获得诺奖后,许多匈牙利人认为他是犹太作家而非匈牙利作家。几年后,他在德国受访时批评了匈牙利在大屠杀问题上采取的回避态度,被匈牙利右翼报纸在头版头条骂为“卖国贼”。当布达佩斯市政府准备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时,有政党公开反对,理由是“他是一个不爱匈牙利的犹太人”。 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在喷吐着犹太人血浆的古泉,凯尔泰斯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提出质疑,他说:“我并未感到那种找到了家的感觉。总之,各种预计好的体验都没有发生。我到是不是犹太人?”坐在犹太教堂的祈祷人群里,他感到拘谨和惶恐,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另一种犹太人。“我到底是哪种犹太人呢?哪种都不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寻找家乡,也不再寻找自己的身份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自己不一样……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又是谁呢?”他在犹太身份的问题上否定(杀死)了自己。 在《另一个人》里,凯尔泰斯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质疑自己,“我是知道,还是仅仅相信自己叫‘凯尔泰斯·伊姆莱’呢……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时,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时,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他痛恨这个带着羞辱的名字,并在名字的问题上否定(杀死)了自己。 凯尔泰斯不忌讳谈论死亡,他说:“人类准备死亡,就像准备创作最后一件作品。”德国剧作家黑贝尔的一句话可为其做注:“人类将上帝的思想冻结成冰,由上帝吹进我们体内的神火与我们被冻霜包裹的躯体相比较;无论是火融化了冰,还是冰熄灭了火——人类都会在较量中死亡。” “奥斯维辛无处不在” 凯尔泰斯对电影《辛德勒名单》做过出人意料的严厉批评,认为“在描绘大屠杀时,任何不能或不理解大屠杀与生命改变方式之间根本联系的作品都是媚俗的”。他对结尾尤为不满,认为在黑白影片的结尾突然出现彩色的人群是将历史的苦难媚俗化,将大屠杀的意义简单化,这种情绪化的渲染让观众以为集中营烧掉,大屠杀就结束了,幸存者就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凯尔泰斯还尖锐批评斯皮尔伯格的缺乏对由奥斯维辛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展现,认为他“拙劣地”让人和人文理想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

后来,凯尔泰斯的小小说《命运无常》被拍成电影,由匈牙利著名摄影师科陶陶伊·拉约什执导,凯尔泰斯亲写剧本。据科陶陶伊说,凯尔泰斯只去过一次片场,因为搭建的集中营唤起了老人太多的恐怖记忆,但始终是他的后盾和助手。影片打动了,但并没有达到小说的深度和效果,因为直观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让人很难不动声色地进入少年无辜的角色。 凯尔泰斯的批评是正确的、有理由的,他的思考也确实比斯皮尔伯格深刻。《辛德勒名单》讲述纳粹大屠杀,而小说《命运无常》讲述的是人类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主人公幸存并不意味着大屠杀结束,“奥斯维辛无处不在”,“大屠杀是一种文化”,从来就有,还会发生,奥斯维辛只是大屠杀的高级形式,凯尔泰斯始终都在阐述这种论断,他认为奥斯维辛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凯尔泰斯说过:“人类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了一个和平的废墟。”这句话令人绝望,也令人深思:虽然集中营建了,但大屠杀并没有停止,人类又建起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所以,凯尔泰斯作品所写的不仅是过去发生的大屠杀,更是警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具有见证意义的文学,因此或许对未有益,甚至可能服务于未来。他始终在思考奥斯维辛造成的精神重创的影响,联想到今天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样思考奥斯维辛,或许方式有些反常,或许可以使我更多地思考未来,而不是过去。”凯尔泰斯将作品献给了大屠杀的所有死难者和所有仍在缅怀死难者的人,不分时态。 凯尔泰斯把大屠杀提升到了人类文化的层面,对人类自身提出了警告。他本人则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生死。他之所以不想自杀,是因为他“可以写对惊讶与失望的见证——我们如何在类似的状况中存活下来,并如何理解它”。对他来说,死要比活简单轻松,“我试图去与一些真相缠斗,讲一个不被允许讲出来的故事。我是从这一切当中幸存下来的人”。 这让我想起凯尔泰斯去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多瑙河畔佩斯岸边的艺术宫大舞台上,一个隆重的“凯尔泰斯之夜”。他作品的第一位评论者施皮格和助手雷夫奈尔,这三位最熟悉凯尔泰斯的人从各自角度谈凯尔泰斯和他的作品;老人默默地坐在高处,从开始到结束都一言未发。现在想来,那是他对尘世的正式告别。我在黑暗的观察席里远望着衰弱得只剩下灵魂的老人,想到去年8月底在“理想国”编辑部的那次三人谈:我、王家新、宁肯分别从译者、诗人、作家的角度谈凯尔泰斯。我能感觉到老人在场,他在我们的灵魂场里,并透过我们的身体望着读者。 老人用目光鼓励活着的人:“只管往前走,永远别回头,死亡就在前边——看哪,你是自由的。”他让我们看到,抵达自由,文学是一条可以无视羁绊的路。

凯尔泰斯三人谈:

没有什么文字能比他的更刺痛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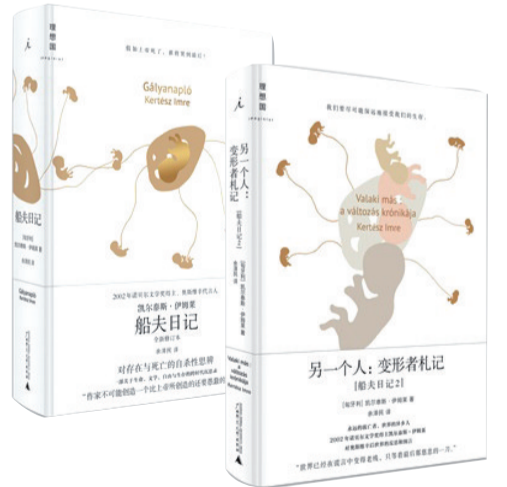
余泽民 王家新 宁肯

余泽民:宁肯曾说凯尔泰斯是一颗“弱星”,这个词给了我深刻的触动。 宁肯:凯尔泰斯的作品让我想到黑色,类似于卡夫卡。卡夫卡的黑色有绝望、荒谬,还有反讽、幽默。但凯尔泰斯就是纯粹的黑色,在黑色之中有一些星星。人类的思想上有一类人是“弱星”,它们在边缘的地方闪耀,不是不亮,而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但它们也照亮了我们的内心。 阅读凯尔泰斯,你会觉得最熟悉的部分变得陌生起来。比如他访问东德时,去参观一个集中营,暴雨后人们躲到休息室里,讲解员用枯燥的声音讲述死亡,在这样悲惨、令人震惊的场所和历史语境中,伴随讲解员枯燥的描述,旁边一队的青少年还有接吻的,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是不对的。这些少量但精彩的描述,显示出凯尔泰斯是一个叙事的天才。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如一些重要命题:奥斯维辛、集权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必然性。凯尔泰斯谈到集权下每个人都有一种宿命的东西,这构成所有人的个性。他还引用纽伦堡审判的心理学家吉尔伯特的描述,说纳粹行刑官看起来也是个正常人,但实际上他有精神分裂式的冷漠、麻木,内心缺少情感。凯尔泰斯觉得吉尔伯特的描述非常准确,认为这是他们这些人的特征。这种认识对当代现实生活中也非常有意义。 凯尔泰斯是一个绝望式的作家,具有一种绝对的个性。绝望的写作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世界是悲观的,二战胜利后,他生活的环境仍然是绝望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除了自己欲望,《命运无常》出版以后,他完全陷入一种沉默,没有任何兴奋或羞耻。这正好折射出那个时代作为他自己存在的绝对个性。 王家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是什么

在我们身上痛苦”,主要是谈凯尔泰斯。我曾在德国斯图加特听过一场大型露天音乐会,演奏“贝九”,指挥是从以色列请来的,听众都是中产阶级,演奏到高潮时礼花升上天空。但那一夜我极其痛苦,我坐在德国的黑夜里问自己,你不是犹太人,没有经过奥斯维辛,是什么在你身上痛苦?读了凯尔泰斯我们就会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痛苦。从《命运无常》的那个孩子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早年。谈凯尔泰斯,那些内在于我们身体里的创伤被撕开了。 凯尔泰斯比很多描述奥斯维辛的作家更有勇气,也更彻底。奥斯维辛是欧洲20世纪下半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或说一个障碍。奥斯维辛最初并没有引起关注,但经过很多知识分子、作家从哲学、神学、美学、文化、种族问题等角度不懈地追问,它才上升为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他是从“文化和野蛮的辩证法”角度下的论断。奥斯维辛是对欧洲文明和信仰的一次深度撞击。整个欧洲文化要对奥斯维辛负责。文化的“同一性”、对他者的排斥、对差异性的抹杀,在奥斯维辛达到极致,成了野蛮的同谋。凯尔泰斯有很多思想比较接近于此。奥斯维辛事件就像一个集权的密码,凯尔泰斯就是要深入揭开这样的密码。 凯尔泰斯的写作有一种彻底性,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切。对他来说,奥斯维辛无法用过去的方式来表现,奥斯维辛是一部还在连载的小说,没有完成,而且对他而言是永不完成,他的绝望和勇气都体现在这里。这使我很受震动。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诗人,我也深感惭愧。没有什么文字能比他的更能刺痛我们。 余泽民:凯尔泰斯所有的作品写的都是奥斯维辛,他说自己成为了奥斯维辛的代言人。他还

说,奥斯维辛是一种文化,将思考提升到俯瞰自身的高度。他说的奥斯维辛并不仅指过去,而更指向未来。这是他对奥斯维辛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现代人的警示。 对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永远不可能过去。他说自从人类发生了奥斯维辛之后,人类需要重新审视文学,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要写作。凯尔泰斯说他也会写流行小说,但他只想写奥斯维辛,他只想让奥斯维辛在书架上能够占有一个位置,哪怕非常小,因为奥斯维辛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在《另一个人》里,凯尔泰斯写一个人如何能在大灾难后生存下去。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主题。他也一直以这种态度应对生活。 凯尔泰斯一生都在对身份进行“自杀性”拷问和反思。他虽有犹太血统,但出生于并不信犹太教的犹太家庭,连家姓都匈牙利化。他没把自己当做犹太人,却因犹太血统被投入集中营。获得诺贝尔奖后,匈牙利许多人说他是敌视匈牙利的犹太作家,他在日记里也反复说自己“用自己的母语去理解凶手”,但这并不是对于国家和家乡的敌视,而是对大屠杀文化和人类堕落的敌视和抵抗。 无论何时何地,凯尔泰斯都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反复思考自己的身份与处境。冷战时期,他去东德,在过海关时战战兢兢地接受边检,受到猜疑和歧视。他作为犹太人遭到歧视,作为匈牙利人也遭到歧视,遭到双重的歧视。他把这种屈辱写得非常深刻。 在翻译《命运无常》时,我和校对为了一句话的译法起了争执。书里描写主人公的父亲第二天将被送进集中营,一个老邻居为父亲送行时说了一句话,意思是:勇敢地低下你的头吧!校对认为应该是“勇敢地抬起头来”。但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因为“敢于低头”。

他们“低头”时,照样会记住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血脉传承。凯尔泰斯在《船夫日记》里说过一句话:生存即屈服。“屈服”是保持沉默,不与极权为伍,不做独裁者的同谋。他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 为什么凯尔泰斯一直在控诉匈牙利?因为一战和二战时,匈牙利政府陆续颁布了两部犹太人管理法,对犹太人进行歧视和迫害。凯尔泰斯把迫害匈牙利犹太人的罪责完全推到德国人身上,他认为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人也要承担罪责,但匈牙利始终没有正视历史,没有向遭受大屠杀迫害的人道歉,始终未能做彻底的反思。 凯尔泰斯一生中曾有过三次机会可以离开匈牙利,但都放弃了。他要通过母语,在最近的距离去理解匈牙利。我翻译他的作品时,不愿把他看成匈牙利作家或犹太作家,他是一位人类的作家。 宁肯:这种屈从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凯尔泰斯在屈从的时候也在抵抗,勇敢地低下头,就是包含了屈从的抵抗,对于当下生活非常有启示。 王家新:凯尔泰斯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是在更普遍意义的层面上进行的。他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扩展到和每一个人命运都深刻相关的程度。所谓犹太人,在他看来就是人在集权状况下的一种状态,对此我特别认同。他的一些描述特别富有启示性,比如火车站上的警笛声、尖叫声,犹太人从打开的车门拥出,在军官面前,忽然发现自己身上居然穿上了囚衣。这样的描述透出了他对人自身命运的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揭示力。 我还特别佩服凯尔泰斯的艺术勇气,他的作品在一般读者读来完全缺乏可读性,但他一意孤行,绝不妥协。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目的并不是要写出好看的小说,而是对人生和历史进行总结。凯尔泰斯也一样,完全打破了



寻常的写作模式、小说观念和一般作家斤斤计较的东西,这是他的艺术勇气所在。他也因此提升了文学的尊严和个人独创性。他的语言尖锐、有质感、不空洞,每一句读来都有一种刺痛感。 余泽民:凯尔泰斯语言中的处处闪耀思想的光泽。比如,他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创造出比上帝创造的更荒诞的世界”;比如,他谈论“现代”或“摩登”时说:“摩登,并不是年轻时代的风尚,而是老年时代的,他不是开始,而是最终必须。艺术就像一个胚胎,它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必须经过它所有的发育形式。” 王家新:这些句子是从凯尔泰斯的整体创作中生长出来的,并不仅限于字面,它还存在着本身的显现和揭示,比如,“1994年的秋天,寒冷的多瑙河畔,接近黄昏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的宫殿上”。从本质上看,凯尔泰斯是一个诗人,他有诗人的语言表述方式、修辞和隐喻。他不仅有思想上、道德上的严格性,还有对语言的非常彻底的严格性。我记得茨维格那有这样一句诗,意思是“你甚至用我的血来检验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凯尔泰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也经得起这样的检验。 (本文根据2015年8月在“理想国”凯尔泰斯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